

#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因素

张 泽

(中共中央党校 校刊社, 北京 100091)

**[摘要]** 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而反共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共主义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长期性、顽固性;波动性、反复性;复杂性及范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包括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制定相应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将对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达到双赢,并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意识形态;反共主义;麦卡锡主义;美国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7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6)02-0017-07

如果要选出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话,那么,中美关系毫无疑问将会是多数学者或政府官员的首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离开中美关系来谈论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是难以做到的,要了解中美关系的内在动因,就必须深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因。而意识形态在理论研究以及政策实践上的作用十分重要,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如此,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 一、美国意识形态的内涵

### (一) 意识形态的含义

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中,由于评价标准不一,学术视角不同,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解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意识形态”这个名词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迪·特蕾西以“*idéologie*”(其意为“关于观念的学说”)而表达的一种概念。这一概念的原

始意义或者功能,是一种关于特定使命的科学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利益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是指以理性为基础的信念,是一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在概念上存在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就广义而言,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套关于世界的观念、看法、思想构成,被认为是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括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好,同时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

而本文则是在狭义的范围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领域内来分析和运用,即所谓的“特殊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国际政治学界有几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卡尔·曼海姆的观点认为,“当这个词表示我们怀疑对手提出的思想和陈述时,它便意味着特殊意识形态概念。它们被认为有意无意地掩饰了一个情况的真实性质,而如实承认这一情况不符合他

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撒谎到半意识和不知不觉的伪装,从蓄谋骗人到自我欺骗。”<sup>[1] (P122)</sup>王逸舟则认为,“特殊意识形态”一般都以国家为背景、承受主体和“发动机”,它总是带有抬高自我、贬低对手的内容特征和通过国家机器向大众强制推广的形式特征。<sup>[2] (P234)</sup>而王缉思教授认为:“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sup>[3] (P206)</sup>

## (二) 美国意识形态构成中的反共主义

意识形态具有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而所谓的美国意识形态也同样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按照特定的政治逻辑以一种独有的结构方式存在互相作用,并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归纳起来,这些元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所谓“美国主导”为标志的历史使命感;关于普遍的“自由与民主”权利的政治价值观念;“反共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等。

可以说,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美国意识形态贯彻的是一个基本的思想主题:以所谓自由和民主为政治价值观,以反共主义为政治制度思想,以美国主导为历史使命观,构成了其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的整体。一方面,意识形态为美国外交提供了指导性的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本身也早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如前所述,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是个人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价值观念、美国主导的历史使命观、反共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的集合体,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一部分的对华政策上,其影响则具体体现在反共主义对华政策的运用、对华人权外交以及对华新冷战思维等方面,而反共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其中的重点。

自从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后,它就受到了欧洲各国反动势力的顽固反对和攻击,因此,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美国专利,也并非美国独有。俄国十月革命后,反共主义开始成为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反共主义基本主张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

思想或精神价值体系上,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其次,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妨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最后,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美国立宪民主的威胁。在国内,1919年8月、9月间,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党刚刚成立,美国统治集团就进行了政治镇压。1920年1月2日,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突袭,对共产主义势力实施政治恐怖。以后,反共主义一直是美国的主要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在国际社会中,美国早在1918年6月就派出7000名军队人员干预俄国革命事业。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镇压过程中,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并成为深入其政治骨髓的外交政策指导思维方式,二战以后美国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包围、封锁、制裁等一系列敌对行动,都与其固有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系。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1950年2月,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彻底放弃了艾奇逊的所谓“等待尘埃落定”政策,将中国定性为苏联的附庸。杜鲁门政府特别强调“对付共产党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sup>[4] (P75)</sup>此后一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和反对的观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与和平的维护。

## 二、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 (一)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影响高峰期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国内和外交上对前苏联的反共主义正迎来一个新的高潮,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的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中,充分反映出美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政策。杜鲁门主义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给予希腊和土耳其怎样的援助和多少的援助,而在于奠定了战后美国外交,尤其

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取向。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美国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背景。

1949年,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当时美国朝野带来了极大的震惊和恐慌,也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激烈争吵。但是即使如此,当毛泽东宣布新政府将实行“一边倒”政策时,美国并没有立即实施完全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1950年初,当中国政府与苏联签署有效期为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美国政府开始确立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比较明确的评价和看法。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开始全面占据主导地位,而此时恰逢美国国内出现了“麦卡锡主义”的政治狂热,为这一过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想当然地认为,国内必定有一批“亲共分子”正在帮助共产主义征服中国。正是在这一片反共主义的叫嚣中,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一词始于1950年,词根来源于美国共和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姓。那一年的2月9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惠灵(Wheeling)一家妇女俱乐部纪念林肯诞辰的活动中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公开指责国务院内充斥着共产党人,并声称他掌握了一份在国务院工作的205名共产党人名单,这些人国务卿明知其为共产党员,但仍留在国务院内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此话犹如晴天霹雳,令美国朝野一片哗然。麦卡锡也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跃升为名声显赫的全美政治明星。从惠灵演讲开始,麦卡锡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共产党活动的浪潮。1953年共和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之后,麦卡锡通过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清查共产党运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的清查。麦卡锡及其调查委员会的人员,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无视正常的法律程序,对他们怀疑的,包括高级官员、外交官国会领袖等在内的一切人进行任意调查。调查活动越来越大,涉及的人越

来越多,而麦卡锡的声望当然也随之越来越大。联邦政府中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数千人因麦卡锡主义失去了工作,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直接渗透进美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美国国内的左翼力量受到空前的打击,原本力量就十分薄弱的美国共产党更是遭受沉重打击。一些左翼的组织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中间派和自由派迅速投靠保守势力。此时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上占据了主宰的地位,而这些也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得到了反映:在经济上,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全面贸易禁运和封锁;在政治上,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继续制造“两个中国”政策,干预中国内政;在军事上,实施地缘战略攻势,并导致后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战后以来,在欧亚大陆上,美国同非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战争冲突行为中,主要对象之一就是中国。

## (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影响的平缓期

引起这一时期变化的直接起因是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则是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亨利·基辛格认为,越南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成功的战争。就尼克松而言,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归根到底,就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问题。即使没有这段煎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再评估也有其必要,因为美国几近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也接近尾声了。美国的核子优势正在式微,美国的经济独霸地位亦受到欧洲和日本蓬勃成长的挑战。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亦出现严重缝隙,中共和苏联的分裂更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有相当的空间可供新的外交弹性转寰运作。<sup>[5] (P. 624-651)</sup>正是在上述国际形势的变更中,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即为了赢得对苏联的权力优势,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联合中国或缓和中美关系,以最小代价确保国家安全。这一时期的美

国对华政策中尽管仍然受到反共主义的影响,但是尼克松政府尽力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为出发点和核心,力图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把中国与前苏联区分开来,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卡特上台后,虽然一度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但是,苏联在非洲、西亚和东南亚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当时仍然处于越战后的衰落期,靠自己及其传统盟国的力量,无法有效地组织苏联的扩张势头,而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改变,已经有 111 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基于对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卡特政府下决心加快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此基础上,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其中明载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说在与中国事实上的交往中,卡特政府是弱化了反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在里根政府时期,虽然里根本人在执政之初曾经有过强硬的言论,但里根主义的出台,基本目标仍然是苏联,里根执政初期,美中关系起伏波折,但随后就趋于平稳,期间对两国关系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的对台军售问题,但是也最终以双方共同发表《八一七公报》的形式避免了冲突。在里根当政期间中美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可以说在对华政策上,里根政府最终大体延续了以中国作为其对抗苏联一环的政策,没有让意识形态因素破坏中美交流继续发展,尽管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 (三)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共主义

#### 1. 老布什政府时期

冷战的结束、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转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规定了新的大环境,而 1989 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则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妖魔化中国的思潮,针对中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强烈回潮,而这些也成为老布什政府采取强硬反华反共政策的借口。同时,老布什政府还趁势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

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sup>[6] (P: 583-584)</sup> 1990 年 1 月 31 日,布什政府在国情咨文中强调: 40 多年来,美国和它的盟国一直在遏制共产主义,以确保民主继续存在。今天,由于共产主义开始崩溃,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保民主向前发展,在缔造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希望——一个伟大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自由国家联邦——方面走在前面。<sup>[7] (P: 773)</sup> 1993 年 1 月 5 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再次宣称:“冷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道德与物质资源,以促进民主与和平。我们有责任、也有机会进行领导。没有其他国家能担当这一职责”。<sup>[8] (P: 215-216)</sup> 由此造成一段时期内,美国反华反共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上的步步升级,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视为其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进而调整了对华对台政策,由冷战时期的“联华抗苏”转向“以压促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导向的对华政策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且这种敌对更多的是体现在外交言论和口头上,中美之间仍然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尽管一直受到国内政治和国会的强大压力,在老布什执政的后期,他的对华政策仍然实现了从高压遏制向“接触+遏制”的转变。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经历的是一个从短暂亢奋到回归平缓的过程,而亢奋是短期的次要的,平缓则还是主流。

#### 2 克林顿政府时期

在克林顿第一次入主白宫的初期,和他的前任一样,同样出于选举和国内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高压的手段。新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是“将谋求促进中国实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和平演变(克林顿托弗语)”。克林顿并将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挂钩。他明确表示,要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一些条件。1993 年 5 月 28 日克林顿政府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为

再延长一年提出七项附加条件,要求中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取得全面、重大进步”。7月至9月期间,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于是美国众议院以“侵犯人权”为借口,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联合国搞反华提案等等。美国的一系列举措损害了中美关系。但是从1993年9月开始,美国开始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推出“全面接触”战略,中美关系出现好的转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中美关系改善的重大意义,即若不及时调整对华政策,西欧、日本必将乘虚而入,使美国失去中国这一大市场,每年损失80亿美元,相当于15万人失去就业机会。在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在许多方面需加强同中国的合作。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高级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这次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政府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这一时期,中美发展平稳,较为正常,基本上排除了反共意识形态对两国关系的实际干扰。但在台湾问题上,1995年2月至1996年3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严重违反了“三个公报”中确定的中美关系的原则,曾经使中美关系处于低潮。不过到了1996年3月至1997年初,美国再次调整对华政策,由遏制转为接触。

1996年克林顿第二次当选连任美国总统,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美国政府采取了“加深接触”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克林顿强调“更加深入”地同中国进行对话和接触是处理双方分歧的“最好方式”。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共同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提前专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989年以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华,双方发表了三个联合表明,达成数十项共识,标志着两国朝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又迈

进了一大步。

当然,这一阶段中美之间仍有摩擦和斗争,其国内顽固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不时发出干扰的噪音。例如,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继续坚持不合理要求,使问题复杂化;强化以美日安全同盟为新亚太联盟体系,力图将东盟地区论坛改造成“多边安全机制”;扩大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范围,将台湾海峡纳入其范围内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干扰最小的之一,基本上保持了以交流、接触为主流的政策,中美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3 小布什政府时期

小布什被普遍认为是保守主义思想最严重的美国总统之一,其高级幕僚班子里也充斥着保守主义的气氛,而所谓的保守主义外交思维正是反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变种,并深刻影响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其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一样,小布什上台初期在对华政策上也表现出强硬的一面。早在竞选期间,小布什就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称中国是美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上台后在具体政策或战略实施上,继续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接触加防范的战略,但在继续接触的同时,防范的色彩更浓了。小布什政府执政后,中国被美国看作21世纪“最大的挑战”。国务卿鲍威尔就宣称,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贸易伙伴。在《四年防务报告》和《2002年度国防报告》均指出东亚有一个有潜在资源优势的军事竞争者可能出现,意即指中国。《核态势评估报告》也把中国列为突发事件中的核打击对象。

2001年上半年,由于小布什对华的强硬政策,加之4月的中美军机撞击事件和美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的风波,中美关系再次乌云密布,有学者甚至预言,中美将爆发新的冷战。美国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被人认为,本届政府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为保守和最具浓厚军事背景政府。”究其原因,笔者倾向这样的看法,“它受特色鲜明的美国式国际主义思想内涵的驱动,将国家利益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对单边主义宠爱有加,强硬外交的浓墨色彩亦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sup>[9] (P24)</sup>

9·11事件爆发后,基于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美国逐渐地改变了对中国的强硬对抗政策。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在前期加大了对中国和平演变和“输出民主”的力度,尤其以9·11事件为转折点,美国对中国实行了新的“合作”政策。美国政府基于反恐的需要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逐步改变了对华的强硬路线,强调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实行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化和正常化,9·11事件后美国将中国视为反恐“盟友”)并不意味着美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外交意志对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实质性改变。实际上,同样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时”实施对中国的敌对政策,甚至可能将中国列入到“邪恶轴心国”的“核心国”之列。9·11事件恐怖袭击虽对美国霸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并没有真正分化美国社会,并没有动摇美国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核,相反却增强了美国的内聚力,进一步激活了美国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保守势力的扩张。并有可能强化其对外政策中的反共反华倾向,意识形态外交有可能重新复活。

### 三、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 对华政策影响的特点

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有许多规律性问题值得总结。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复合的态势出现,并体现在许多方面上。它既体现为所谓美国主导的历史使命观的影响上,也体现为以所谓自由和民主为主要元素的政治价值观上,更体现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上;它既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历史经历有关,也与“冷战”背景中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关。

归纳起来,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具有长期性、顽固性的特点。美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国内已经是根深蒂固,再加上其以所谓“美国主导”为标志的历史使命感的纠结,使其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天然的敌对性,及试图加以影响和改变的内在冲动。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动就不会根本消除,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在中美交往的历史中,从杜鲁门到小布什的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深深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况仍将继续。

第二,具有波动性、反复性的特点。虽然意识形态因素一直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和作用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因素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显得十分突出,例如在冷战行将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就是如此。但是有些时候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又会被淡化,例如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这使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呈现出波动性、反复性。其原因主要还是出于不同时期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美国政府应对不同国际环境的需求结果,可以说,意识形态因素本身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其外交政策,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第三,具有复杂性及范围广泛的特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和纯粹的,它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在其对华外交实践中进行物化。有时是通过某一种外交思维或理论对决策者的影响来实现,例如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作用就是代表;有时又通过采取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外交的方式来得到体现,例如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外交;更多的时候则是多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复合作用使其对华政策受到影响。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则十分的广泛,几乎渗透到中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的各个领域。这些,使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呈现出很大的复杂性。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以西方（主要是欧洲）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蕴，以所谓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观念，以美国移民运动、国家独立运动为成长资本，对美国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获得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可和精神支持，使其整个外交行为获得了必要的政治认同、法理资源，而某一种外交政策却以极大的破坏方式出现时，意识形态可能会扮演着负面角色。但是同样地，如果经过适当的努力和交流，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仍然有可能产生

正面作用和影响。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主观由客观决定并且不能脱离客观存在，但是主观努力和意识也可以对客观存在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包括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制定相应的国家安全政策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将会对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达到双赢，并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起到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美] 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 [M]. 卢明华, 时殷弘.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 [2] 王逸舟.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王缉思. 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 [A].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年鉴 2000 [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4] Thomas G. Paterson.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M]. Truman to Reag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1998.
- [6] 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7] 梅孜.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4.
- [8] [美] 理查德·哈斯. 新干涉主义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 [9] 陆忠伟. 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双木)

### · 学术信息 ·

## 文化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学术方向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王贞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视角的回归》(载《学海》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大传统”。他们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政治体系和物质实力,政治、军事实力即“硬权力”被人们认为是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参考变量。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社会现实,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一时陷入了“失语”状态,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多元状态,新的范式 and 理论争论层出不穷。其中,文化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不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

(田甲)